

拜金之上的敬畏

在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张百万英镑钞票》中,故事主人公亨利·亚当斯仅凭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钞票,非但没有饿死街头,反而畅通无阻地在世界第一大都会里花天酒地地生活了一个月。那些挡在他面前的各色势利鬼,只要一见到那张附有魔力的通行证,马上低眉下气、满面堆笑地围着亨利团团转起来。亨利的名位一路攀升。

我们无伦异地发现那些整天围着亨利转的势利鬼们,居然也没有一个见财起意,计划着干脆干掉这位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傻小子,把那张无所不能的钞票据为己有。一个拜金气十足的的社会里,能将尊重财产权当作常识,看来一定有着某种比黄金还令人崇拜和敬畏的东西,这东西甚至深扎于势利鬼们的心中。否则,难说人们不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手握百万英镑钞票的亨利。就在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世界上不少地方大行其道的正是这“另一种方式”。

比如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村塾读书时,就亲眼目睹了一伙海盜先天下夜冲进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华侨家中,把屋里所有财产洗劫一空。事后,被抢的华侨绝望地哭诉道:“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还有政府和

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有保护了……”。不仅如此,官府明火执仗的剥夺,也比比皆是。

百万英镑钞票呼风唤雨的魔力是一回事,百万英镑钞票的所属权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令人充满爱欲,后者却让人望而却步。围在亨利周围的那帮势利鬼甚至比亨利还理解这种区别所在,即便是公爵大人,除了对亨利表示尊重外,也没谋划着要串通银行行长、议员政要,一起“因欲困之”。

财产权的威严之所以如此强大,根本之处就在于人们对于财产与个人尊严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德国法学家耶林明确指出:所有权无不是扩展到物之上的我的人格的外缘而已。

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钱财、房屋、土地——随时可能遭受劫夺、拆毁、霸占的威胁,而国家权力不但不能为其提供庇护,反而有时也是构成这种威胁的因素之一,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被剥夺了人格外缘的人,就像是被剥了皮的树,恐怕是再也不能茁壮成长了。所谓拜金之上的敬畏,不过是人们对于自己完整人格尊严至为严肃的热爱与珍惜。

(摘自《书屋》2012年第10期 曹瑞涛/文)

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充当自己家庭伦理剧的主角。到人生谢幕的时候,很多人或许会叩问,在人生某个时刻,人性为何会出现沦丧与误会?

11月14日,在南京街头,一个老汉,穿着旧夹克,脏兮兮的牛仔裤,操着一口外地方言,不停发泄内心的悲愤。老汉姓张,举全家之力,供养了儿子考上南京的大学。儿子毕业后,留在南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张老汉从湖北老家到南京,想进儿子家,去看看孙子,被儿子嫌弃太寒酸,怕丢人不让进家门。那一刻,老人当街下跪,老泪纵横。

呼喊着“救救孩子”的鲁迅,留下过一句经典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此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张老汉以前一定觉得,相较于他那贫困的乡村,在南京上学成家的儿子,是到了“光明的地方”。

光明到底在哪里?现在张老汉一定明白,不在城市的美食美炙,灯火璀璨,而在人性的光亮温暖。儿子的人性迷失,不顾亲情伦理,让他跪倒街头哭诉,那一刻,他同样在呐喊着“救救孩子”。他的孩子是成

近日,印度加尔各答市已婚富家女因与穷汉私奔遭兄长街头斩首一事,冲击了不少国人对“民主印度”的想象。斩首惨剧实无关政治制度,而系“荣誉谋杀”恶俗的滥觞。此恶俗在古老或极端传统的华人社会也有,称为祭家法、洗门风。现今中东和南亚地区为该恶俗重灾区。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约有5000人死于“荣誉谋杀”,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耻部并不为过。

耻部者,野蛮、齷齪以及鄙陋是也。人类进化了至少30万年,有文明史不过6000多年,因此,在人类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不必把人类文明的耻部归于某个民族或文明形态专有,只能说有的社会找到了那片遮挡耻部的树叶,而有的社会至今还在摸索中。

具体到“荣誉谋杀”,其根源不外乎父权制下女性被视为家庭附属品,以及所属文化圈极端敌视性自由。倘两者交汇于某地区,便会诱发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日本封建时代女权不彰,但社会对婚前女性不苛求,所以罕见为了家族声誉而虐杀妻女姐妹甚或侄女外甥女的案例;东南亚虽长期流行回教,性观念保守,但妇女地位较高,颇能自食其力,

12月21日,在广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三名遛狗的女子因清洁工劝其清理狗粪,而对其大声叱骂。路过的盖女士劝架时也被追打。一名业主作证说:“她们(遛狗女子)甚至说清洁工的命还不如她们的狗值钱。”

就在遛狗女子伤人的同一天,在兰州,四五名城管手持棍棒,当街殴打残疾店主。还有在22日,在大连,10余名保安,围殴进入小区施工的两名农民工。面对和自己一样用人格尊严支撑而站立着的人,恶语的伤害与野蛮的群殴,竟是如此轻易地就付诸他人。“命不如狗值钱”这句话,代表性而赤裸地宣示了他们良善认知底线的沦陷;只要权与势低于己者,都可将其踩在脚下。

这些伤人者,也算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即便那三名有闲养狗的女士,其势力场怕也不超过一名最底层的法赋权力者。而城管与保安,最多只能算是借来一种权势而扩大妄为者。那么,他们伤害人的心理与动作为何如此肆意?

教育家许锡良先生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底层的人经常互相伤害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遇到比他们更凶的兽时便现羊样,遇到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个观点有存在的理由。寻找不到平等路径的人,就会自己讨说法,当他们四处碰到坚硬的墙壁,就会发现,向更弱者吐口水,要容易得多。由此,受害者,变成放纵心中愤怒的人。底层互伤还源于传统美德的无断断裂,当原有的道德之善被扫入历史垃圾,功利主义又迅即占领思想市场,原有体系破裂又无良性填充的社会,确实有些茫然无所适从。

现在是应该重建的时候了。如果于大的层面不能立马改观,那么,个体的从良应该被提起。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认同熊培云先生的这句话:你即你自由。抱怨不良的制度原因没有错,把一切都归于制度并以此为借口行不善之事,却不当。守住自己的不作恶底线,才是应有的动作。

(摘自《长江商报》12.24 汤劲松/文)

年人,但没有成人。需要拯救的人性,又何止只是这个人,又何止只是这个人生阶段?

福建80后少妇陈某趁着丈夫睡觉,去浙江见情人,为凑够路费,竟将仅两岁的亲生儿子卖掉,与情人汪某住到一起。经警方解救,离家20多天孩子才重回父亲怀抱。少妇卖子见情夫的那一刻,是人性彻底泯灭,

很可能会给孩子未来种下人性罪恶的因子。

拯救泯灭的人性,离不开社会与国家,离不开制度与法律。但是,不论是不让父亲进门的儿子,还是贩卖孩子的母亲,在那一刻,他们其实都拥有避免出现人性泯灭的选择空间。这就意味着,当人们面对具体真切的“伦理情境”,内心对亲情人性伦理,必须拥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敬畏。

那么多个体在某一时刻的人性泯灭,表明当前必须重新梳理传统的道德伦理,重建符合这个时代的人性文明。只有从文化到制度,串起来一条线,搭起一条路,才能让个体找到适合救赎自己灵魂途径,让人性先被光明照亮。

(摘自《晶报》11.15 单士兵/文)

“荣誉谋杀”一般不会因被强奸、被疑通奸而遭亲人毒手。即便在印度,也存南北之别。北印度是父权制据点,1998年印度女性平均婚龄是16.4岁,北印度女性平均婚龄更低;北印度人重男轻女,“生愈穷,穷愈生”,多见“荣誉谋杀”,而经济发达的孟买和班加罗尔都位于南印度,也就不奇怪了。

在印度的某些乡村,同样恶毒的寡妇殉葬习俗可谓屡禁不止。就在数年前,还有一位35岁寡妇在亲戚逼迫和殴打下,抛掉3个幼娃,跳向焚烧丈夫遗体的火葬堆,而400多名村民却平静地围观这一切。即使没有殉葬,印度的寡妇通常会命运凄惨,陷入婆家不要,娘家不爱,且不许改嫁的困境。而这往往与宗教和法律无关,而纯属上不了台面的文化陋习。

人类共同体的某些极端阴暗面是相似的。我们习焉不惊的某些事,很可能就是一些外人眼中的奇耻。可以试想一下伦敦人读到大月份孕妇被强制引产、黑砖窑智障奴工、关访民的黑监狱等等新闻,或缅甸人看到邻邦“貌甚寝”高官与少女不雅视频的表情。如果说,耻耻近于勇,那么,不知耻呢?

(摘自《南风窗》2012年第26期 谢奕秋/文)

如何停止底层『互伤』

“文革”时期发生在东德的一起车祸风波

在“文革”初期,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极大干扰,当时发生在东德的一起我驻外人员车祸事件,由于某些外交官违背外事纪律,不顾事实向东德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随即演变成一次重大涉外事件。

使馆人员车祸引发“政治谋害”疑云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6月27日,我驻东德使馆一行五人由业余司机程信泉驾驶一辆奔驰轿车外出,但半路上超车时与一辆德国卡车相撞,车上四人死亡,一人重伤。

使馆虽然立即报告了国内,但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报告称:“这一事件必须从阶级斗争考虑,在目前形势下发生这一事件绝非偶然。”

我外交部接到报告后,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派一调查小组乘专机赴德,以查明事故原因。调查组由外交部、公安部和卫生部派人组成,我当时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副处长,也是成员之一。

针对使馆报告中表现的“左”的情绪,外交部于6月28日指示使馆:“在车祸事件未调查清楚前,对外表态要慎重。”6月29日,陈毅外长具体指示使馆:“凡采取重大行动,务必先请示国内。”

使馆擅自采取“革命行动”

然而在调查组抵民德以前,使馆人员不顾国内的上述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6月28日凌晨,我代

改变命运的一分钱

40年前,因盈余1分钱,我在侨辈中鹤立鸡群,并以此为契机一步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1969年2月,我随学校首批上山下乡的同学一起下乡当知青。当时,为了能有点出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挣”表现,我也不甘落后。4月中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我报名参加修水渠。“混”了1个多月后,我比其他知青多挣了50多个工分,也因此成了“收资户”(所持工分多,分得物资后尚有盈余)。“收资额1分”。

这年下半年,因为我们那批知青普遍表现很好,但在小春决算时“收资户”的只有我一人,最终把我评为公社的5名模范知青之一,还排在首位。在不久后举行的上半年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我理所当然地被树成了先进典型。我那些读报纸、写标语,以及在修渠工地睡“连二铺”、讲故事的事,都被拔高为以实际行动投身“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先进事迹”,并整理成数千字的文字资料上报给县革委会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该小组再下发给县属各公社广为宣传。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名人”。

那年

年底,我又被评为出席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了县革委会主任的接见。有了这些“资本”,在后来的各种“评比”、“推荐”中,我始终一路领先。1971年初,我便顺理成章地由农村调回了城市,成为首批回城知青的一员。

第一部“大哥大”被疑为特务发报机

1987年,我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11月,一位在广东省邮电局的亲戚告诉我,广州市邮电局准备推出全国第一批共100部模拟移动电话。如果我喜欢的话,可以帮忙办理。就这样,我拿到了全中国第一个大哥大。当时邮电局的人并不知道这大哥大应该卖多少钱,没法定价。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这钱在当时足以买到一辆丰田牌农用车。朋友们对这“砖头”可好奇了。我告诉他们,这是不用绳子的电话,能打到很远的地方。为了证明给他们看,我用手机拨通了香港的号码,当听筒里传出了可以即时对话的粤语,他们惊得无话可说。

那物

最好玩的一次是我的大哥大丢了,心里颇郁闷。没想到过了两天竟有工作人员通知我去邮电局领取。原来我这手机掉在街上被一市民捡到,他摆弄一番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天线一拔出来就给吓了一跳,以为是个发报机,担心国民党特务又来搞破坏,便战战兢兢送到派出所去。可警察也没见过这个,看见机身上面有广东邮电局的字样,才马上打电话去邮电局核查。我的大哥大这才失而复得。(摘自《成都商报》徐峰/文)

理武官径直闯进东德外交部,向东德副外长费舍尔提出“最强烈抗议”,德方人员对其进行了推阻,并指责他强行进入外交部大楼。

几个小时后,东德副外长赫茨费尔德率多名官员到我使馆吊唁,但我代理武官指责他们来吊唁“是伪善的、是阻挠我方了解真相的”。赫茨费尔德当即转身离馆,这时有使馆同志在门口高举毛主席像和德文标语牌,高呼口号“我们一定要查清四位受难同志遇难真相!”“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当赫氏的轿车启动时,有人还用标语牌砸了他的汽车。

当天下午,使馆在面向大街的墙上还用德文贴出了大字报,内容除“最强烈的抗议”外,一条德文标语这样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

19点左右,东德方面组织近千群众到我使馆门口抗议。使馆则通过扩音喇叭从窗口向示威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打倒乌布利希!”“德群众则以“打倒毛!”回敬……当晚,东德外长文策尔派信使送信给我使馆,对我贴出大字报提出抗议,但使馆同志未拆开看内容就把来信抛到使馆门外便道上,也未将此事报回国内,这还是后来在交涉中我才得知的。

6月30日晨,调查组乘专机抵达柏林机场。调查组离开前,外交部领导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

卖70个牙膏皮买胶卷拍下青春记忆



1965年,我考入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化学系,和6名来自四川各地的女生同住一屋。

一开始,因为口音和方言不同,闹出了不少笑话,甚至不愉快。来自资中球溪的林同学把“下雨了”说成“落水了”;来自彭山的老王,把“荷包”说成“波儿”。我来自重庆,表示否定时,说“叭哟”,这让来自成都的几名室友暗自不爽,以为我在骂人。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能听懂彼此的方言,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那图

大一时,我们7名室友很想拍照留下校园的美景,也记录下自己的青春影像。但学校每月只发1元助学金,大家都囊中羞涩,没有闲钱买胶卷。室友四处找同学要牙膏皮,花费4个月,终于搜集了70多个牙膏皮,以2分钱1支的价格卖了1元多钱,买来一个黑白胶卷,请学长拍下了12张珍贵的室友合照。

(摘自《华西都市报》张永淑/文)

扛着扫把接受采访

在八十年代诞生的文学明星中,徐星绝对是一个另类人物。1985年他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发表,被视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1981年,徐星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不过,对于在全聚德的工作,徐星显得相当散漫,他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配到清洁组去扫地。

徐星后来回忆说,1985年三四月份他去一个朋友家玩,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他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当时他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吗?徐星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小说《无主题变奏》从朋友那里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去投稿,《无主题变奏》让徐星一举成名,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青年主人公“我”的日常心态,同时也描写了“我”和“我”的女朋友老Q,以及“我”的那些室友们的生活情形。

徐星在《无主题变奏》中,借主人公之名说出了自己写小说的绝招儿。我每天想起一点儿就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连贯,等写了一把纸头了,就把它们往一起一串,嘿!就成了。这叫纸牌小说,跟生活一样怎么看都成,就是不能解释。这样的叙事方式显然对于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当然这篇小说的动人之处,并非仅仅在于文学笔法。借用徐星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覆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

成名之后的徐星,仍然在全聚德烤鸭店当清洁工,甚至扛着大扫把接受记者的采访。这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显得很平常。在那个年代舒婷在灯泡厂,在流水线上装灯泡,北岛在一个铸件厂做工人,诗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一个烤鸭店的清洁工人写小说,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那时

(摘自《腾飞中国》12.18 何亮亮/文)

调查组结论为普通车祸被质疑

我们调查组与使馆全体同志商讨如何着手展开调查工作。我们婉转地提出,希望使馆同志注意斗争策略,停止“三大”(即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以正常的外交方式同德方斗争,这当即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提出,使馆贴出的“国外第一张大字报”,应当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

我们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写出了调查报告。结论是:从现有材料看,倾向于一般车祸的可能性较大,主要责任在我方;但“鉴于‘德修’加剧反华,对我敌视,不能排除德方对我政治谋害的可能性,但这方面尚无证据。”应当说,调查结论的倾向性是清楚的,后一句话是照顾了部分使馆同志的情绪,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使馆某些同志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这一案件后来暂时“挂”了起来,直到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外交部领导才肯定调查组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回头来看整个事件的经过,虽然这是一起不难判断的车祸案,但当时使馆某些同志的逻辑却是:事件既然发生在“修正主义”的东德,而“德修”又非常敌视我们,因此应当“优先”考虑政治谋害的可能性。

调查组和使馆人员的分歧,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思想路线的分歧。(摘自《环球》第24期 梅兆荣/文 作者为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那事

我跟姚文元的『侄女』谈恋爱

那是1968年冬天,我下放到朱寨知青组担任知青组组长。1969年开春后,知青组分来一个叫姚姚的上海女知青,从外表上看很文静,小嘴很甜。可是,国庆节后,朱寨大队的干部、社员纷纷传说姚姚是姚文元的侄女儿,还说姚姚不是嫡亲,但她的祖父与姚文元的父亲是同胞兄弟。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乎。当我们问她这件事情时,她却一直讳莫如深。

1973年夏天,我和姚姚都被推荐上了大学。这两所大学在同一个城市。后来,她主动给我寄来了情书,我给她回信也是情意绵绵。

几年后大学毕业,我和她被分到同一所地区“五七干校”。政工组一个干事对政工组长和革委会主任说:“听说姚姚这个人有来头,是姚文元的侄女儿?”政工组长与革委会主任对视一下,然后嘿嘿一笑,说:“早查过了,那是她瞎吹的!”

我一听,大吃一惊。“美女蛇”、“政治骗子”等词语一下子在我脑海里上打翻瓢,之后不再理睬她。她几次想约我单独谈谈,都被我冷冷地推脱了。这样斩断了她对我的情丝,结束了我那段初恋。

“四人帮”被粉碎后,有人检举姚姚投靠姚文元,自称是姚文元的侄女儿。姚姚死活不承认,找到干校党支部书记哭诉:“我祖籍余姚,与姚文元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认得他……”不久,她跟地区电厂一个上海籍的技术员相识、结婚。

那人

(摘自《龙门阵》孟昭虎/文)